基于居民地方感的灾后重建区旅游城镇化建设研究
——以彭州市白鹿镇为例

薛熙明[1],赵俊娴[2]

(1.西南民族大学 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成都 610041;2.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商学院,澳大利亚 悉尼 2006)

摘要: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旅游城镇化被视为一条将产业更新与城镇建设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以地方感理论为基础,从居民感知的角度对彭州白鹿镇灾后重建区旅游城镇化发展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白鹿镇景观城镇化情况良好,人口城镇化较低,对地域城镇化及社会观念和生活方式城镇化的感知则在不同居住区域和住居重建模式的居民间出现了差异。居民感知差异主要受到白鹿镇所处的旅游地生命周期阶段、居民与外来人口比例、居民住所与旅游核心区的距离、居民灾后重建住房类型等因素的影响。最后,文章对旅游城镇化建设的外部导向性、城镇化发展区域不均衡、单一的"自上而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等问题进行了反思。

关键词:旅游城镇化;居民地方感;灾后重建;彭州市白鹿镇

中图分类号:F592.7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8)02-0065-10

旅游城镇化是指以旅游业的发展为动力,通过旅游业的发展推动旅游目的地人口和产业的集聚及城镇在空间上扩张和重构的过程。它包括景观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地域城镇化和社会观念和生活方式城镇化等四方面的内容[1]。旅游城镇化属于"速成型"城市化,它是依托旅游资源的开发、随旅游服务业的发展而产生的[2]。因此,旅游城镇化的产业导向性十分明确。

关于旅游城镇化,国内研究集中在对旅游城镇化发展机制和演化规律[3-4]、旅游城镇化与地方文化和环境保护的关系[5-6]、旅游小城镇的发展模式[7-8]等方面的讨论,较少涉及旅游城镇中的居民。事实上,城镇化使得居民由从事农业生产转为从事第三产业,这不仅仅是其社会身份的转变,还涉及其移居城市后的生活适应、社会融入等问题[9]3。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特定转型时期,"半城镇化"和"被城镇化"现象尤其突出。"半城镇化"指的是进城的农民工实现了职业转换、地域转移,但没有实现身份的转变[10];"被城镇化"则是由于农村土地被强制征用、城中村被强拆或者是乡村撤并,农民被强制集中到城镇或中心村居住等而产生的城镇化[11]。显然,这两种现象并非是建立在居民地方认同基础上的城镇化。在旅游城镇化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因资本或外来者进入而导致的空间拥挤或空间

收稿日期:2017-10-1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灾后重建视野下'家'的空间生产与地方响应——以汶川震区为例"(4137116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产业转型、社会分化与社区重建——基于西部民族旅游社区的实证研究"(16XJAZH004)。

作者简介:薛熙明(1972—),男,湖北十堰人,人文地理学博士,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文化地理学和旅游社会学;

赵俊娴(1993—),女,云南昆明人,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管理。

排斥现象。这导致当地居民的地方感发生显著变化,从传统的地方依恋转向借助经济和社会资本逃离地方。

地方感理论最早始于环境心理学和感知研究,后逐渐被应用于人文地理学对人地关系的研究。地方感是指人类对于地方在主观和情感上的依附[12]14。人本主义学者强调人与地方积极的情感联系,认为地方能够给人稳定的安全感与归属感。但也有学者认为,地方感的核心内涵体现出社会文化建构的过程,并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与发展的过程中[13],甚至出现了全球化背景下"进步的地方感"[14]的概念。地方感理论为地方环境变迁对人的社会文化认知的影响研究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分析框架。在当今旅游业繁荣发展的背景下,借助对旅游地居民地方感的研究,既可透视旅游地经济社会环境发展水平,为旅游影响研究开辟一条新路径,也可在地方政府合理开发旅游资源、减少旅游社会冲突方面产生重要的现实价值。

学者们主要围绕旅游地居民地方感与相关社会文化行为的关系,居民地方感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不同主体地方感的特征差异等方面展开研究。研究者多运用量表分析,解释了居民地方感与其资源保护态度[15]、迁居意愿[16]、旅游支持度[17-18]、旅游影响感知[19]、对旅游企业社会责任的感知[20]之间的关系;也有学者探讨了居民地方感的变迁问题,认为居民地方感会受到遗产申报和遗产符号生产等外部事件[21-22]的影响,或因旅游商业化的强弱程度[23]、新的文化因子进入[24]而发生变迁;还有学者侧重于比较旅游地不同主体间(居民、游客、外来经营者)[25-26]、不同类型旅游地居民间[27]的地方感差异。居民的地方感也被认为是衡量旅游地城镇化建设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已有学者借助问卷调查所搜集的数据建立量表模型,从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感知方面,测算了本地居民对旅游小城镇发展的支持度[28-29],拓展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然而,由于地方感关注人的心理变化,仅仅依赖单一的量表分析无法准确诠释相关现象,故而需要结合质性访谈资料进行更为全面的研究。

5.12 地震后,四川省多个受灾乡镇制定了以旅游业带动城镇发展的战略规划。不同于一般的旅游城镇,灾后重建地的旅游城镇化过程是将城镇建设与旅游发展融为一体,具有发展速度快、景观辨识度高、产业结构变化大等特点。10 年间,尽管一些灾后旅游地成功地完成了经济恢复、产业转型等重建目标,但这些成果能否获得当地居民的认同,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评估。本文试图运用地方感理论,从景观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地域城镇化和社会观念和生活方式城镇化等四个层面[1],测度居民对灾后旅游重建地的感知,以此来反思灾后旅游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为灾后重建相关城镇规划和产业政策安排提供借鉴。

一 案例地概况与旅游城镇化发展现状

(一)案例地概况

白鹿镇位于四川省彭州市,距成都市区仅 60 公里。白鹿镇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优良,森林覆盖率高达 90%,吸引了大量周边城市的游客。由于白鹿镇气温较周边市区低 5-6℃,每年 6-9 月,有大量来自成都等大中城市的老年人来此长住避暑。此外,白鹿镇还拥有独具特色的天主教文化遗存。其中,建成于 1908 年以培养高级神哲人员的上书院被划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8 年的汶川地震中,紧邻龙门山断裂带的白鹿镇也成为重灾区。原有以黄连种植和采煤为主的产业结构受到极大冲击。在福建厦门援建方的帮助下,白鹿镇以中法风情小镇为主题形象进行规划,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震后以旅游业为导向,包括住宿、餐饮、铺面出租等相关产业收入占当地居民总收入的比重大大提升。白鹿镇现有常住人口 1.02 万人,包括了 9 个村社。考虑各村社的旅游发展情况和城镇化进程,本文将调研地确定为白鹿场社区(1603 人)、水观村(1074 人)和回水村(1034 人)三个旅游发展基础较好的社区。其中,白鹿场社区为旅游景观和旅游设施最为集中的地区,回水村则拥有上书院遗址,邻近白鹿场的水观村部分农户从事农家乐餐饮接待服务。

(二)白鹿镇旅游城镇化发展现状

自 2011 年白鹿场重新开街以来,旅游城镇化为白鹿镇带来了三个方面的显著变化。

1.基础设施升级

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白鹿镇努力做到基础设施先行。借助福建厦门援建方和各级政府财政资金的支持,白鹿镇改善了当地的公路、医院、学校以及卫生条件,为旅游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也大大提升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震后陆续新建了

白鹿镇水厂、污水处理厂、消防站、供气站以及医院和小学。双向两车道的小夫路(彭州市小鱼洞至什邡市冰川镇夫子院)穿镇而过,连接着彭州市与什邡市,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旅游公路。由成都市区驱车2小时即可抵达白鹿镇。

2.产业更新转型

通过灾后重建,白鹿镇基本实现了一、二、三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在发展旅游之前,白鹿镇的经济发展完全依托高耗能、高污染的采煤业和投入产出比较低的药材种植业。震后由于土壤变化和环保要求,原有产业难以为继。旅游业恰为白鹿镇产业转型提供了重要契机。重建后白鹿镇依托当地独特的气候和人文旅游资源,相继开发了法式风情小镇观光旅游、乡村避暑旅游、天主教文化旅游等多样的旅游产品,并通过各类事件营销活动,大大提升了该地知名度。2013年,白鹿镇全年接待游客已达100万人次;2014年,白鹿镇被评为国家AAAA级风景名胜区。旅游业正逐步发展成为该镇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断完善。

3.居民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增加

旅游城镇化为白鹿镇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2007年以后,由于当地煤矿的全面关停,白鹿镇的主要劳动力不得不外出打工寻找生计来源。2011年白鹿镇旅游开发以来,当地居民参与旅游经营的意愿增强,自发从事旅游接待、在旅游经营公司就业等机会明显增多,与此相应的是当地居民收入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白鹿场和水观村是旅游获益最多的两个社区。以白鹿场经营客栈的居民为例,2016年,客栈日租金已达100－120元①,人均年收入较2007年增长了1－5万元。2015年,水观村居民人均收入已达到1.3万元,较2007年的0.45万元,增长了3倍,其中很大一部分收入是来自农家乐经营收入②。

二　研究方法

在测度地方感的过程中,学者们运用了单维度模型、三维度模型(认知、情感、意象)、四维度模型(连续性、自尊、区别性、自我效能)和五维度模型(评估、熟悉、依恋、连续、承诺)。由于本文调查对象是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的乡村居民,不适宜运用较为复杂的地方感维度来分析,因而以认知、情感、意象作为分析维度。为全面了解居民的地方感,弥补单一量表分析容易忽略居民主观感受的缺陷,我们采用结构式访谈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于2015年12月和2016年2月分两次对白鹿镇部分居民进行了为期10天的调查。

首先,我们在当地居民中随机派发问卷,共发放230份问卷,回收208份,问卷有效率达到90.4%。问卷调查对象属性特征分布较为合理,具有一定代表性。问卷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30个测量语句项,关于当地居民对白鹿镇的总体感知、形态重构感知、活动重构感知和意义重构感知;第二部分20个测量语句项,关于居民的地方依赖和地方依恋;第三部分为居民的基本信息,含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出生地、居住状态、居住时间、灾后重建房屋类型七项(见表1)。

表1.问卷调查受访者基本信息

基本情况	类别	样本数	比例(%)
性别	男	100	48.1
	女	108	51.9
年龄	14岁以下	3	1.4
	15－24岁	32	15.4
	25－44岁	71	34.1
	45－64岁	80	38.5
	65岁以上	22	10.6
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	67	32.2
	初中	73	35.1
	高中(中专)	46	22.1
	大专及以上	22	10.6
出生地	是	162	77.9
	否	46	22.1
居住状态	户口未变	192	92.3
	户口外迁	13	6.3
	户口回迁	3	1.4
居住时间	1年以下	5	2.4
	1－10年	9	4.3
	11－20年	33	15.0
	20年以上	161	77.4
灾后重建房屋类型	原址重建	16	7.7
	统规统建	64	30.8
	异地安置	6	2.9
	维修加补	26	12.5
	统规自建	95	45.7

问卷采用5级李克特量表,由被访者对相应语句进行打分,5表示非常同意,1表示非常不同意。问卷数据采用SPSS19.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分析。问卷数据的克朗巴哈的α系数最小值为0.963,KMO指数最小值为0.923,其显著性 $p<0.01$,说明该问卷的可信度和效度较高。

其次,我们在问卷受访者中选择了17位当地居民作为结构式访谈的对象,他们涵盖了不同年龄段、职业、重建类型、居住区域等几个类别。既有研究多从经济、社会、环境等三个层面来测度居民对旅游城镇化影响感知,测度指标包括:(1)经济方面,如居民收入、物价水平、就业机会等指标;(2)社会方面,如思想观念、犯罪率、人口数量及结构等指标;(3)环境方面,如环保意识、环境状况、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状况等指标[28,29]。我们参考这些指标,着力从居民对地方的认知、情感和功能性需求等方面的态度来设计访谈提纲。经预调查后发现,当地居民对城镇基础设施和自有住房形态变化的感知、对获取收入能力和就业机会的感知、对城镇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的感知、对不同区域差异的感知、对社区邻里关系的感知较为明显,因而将访谈内容主要聚焦于上述方面。受访者中,男性6名、女性11名,受访者的年龄在25—64岁之间(见表2)。每位受访者访谈时间约40~60分钟。

表2.结构式访谈受访者基本信息

编号	年龄	居住区域	就业	编号	年龄	居住区域	就业
F1③	52	水观村	务农	F10	35	白鹿场	农家乐经营
F2	42	白鹿场	务农	F11	64	回水村	务农
F3	49	白鹿场	农家乐经营	M1	43	白鹿场	农家乐经营
F4	33	外来	店铺经营	M2	54	水观村	农家乐经营
F5	60	水观村	务农	M3	34	水观村	农家乐经营
F6	46	水观村	务农	M4	45	回水村	外出务工
F7	25	回水村	外出务工	M5	37	水观村	农家乐经营
F8	28	水观村	外出务工	M6	50	水观村	农家乐经营
F9	52	水观村	环卫				

三 居民感知的白鹿镇旅游城镇化水平

(一)居民对景观城镇化的感知

旅游业的发展使景区内的农村聚落转变为城镇景观,或者在景区、度假区内某些原本是自然景观的地方集聚大量的商业和服务业,并伴随道路、基础设施等城镇设施建设,使景区内出现众多城镇景观[1]。2008年汶川地震中,由于白鹿镇距震中仅有30公里,故而镇内原有景观在地震中损失殆尽,上书院也不复存在。震后在政府的统一规划和扶持下,白鹿镇被建设成为法式风情小镇,并不断吸引着来自各地的游客。白鹿镇以白鹿场社区为中心,承担着大部分游客的接待工作,这一区域在重建后景观变化最大。

1.基础设施感知

在旅游城镇化的带动下,白鹿镇的基础设施建设迅速完善起来,并得到了多数居民的认同(见表3)。

表3.白鹿镇不同区域居民对旅游城镇化的形态感知均值

居民感知	白鹿场	水观村	回水村	总体
环境改善	4.16	4.4	3.79	4.22
基础设施改善	3.91	4.47	3.59	4.15
生活便利	3.77	4.4	3.52	4.09

交通条件的改善令当地居民深有感触。震前白鹿镇通往彭州市的公路为水泥与柏油混合路面,道路弯曲狭窄,通行速度较低;地震后,政府出资将该公路修缮为全程双向二车道的柏油路,汽车通行时速最高可达60公里/小时。同时,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白鹿镇的客流量逐年增加,目前彭州至白鹿的客车对开班次已增至每半小时一趟,极大地方便了当地居民的出行。

环境卫生是居民们认同度最高的一个方面。白鹿镇原有支柱产业为采煤业,整个镇区道路日夜通行重型运煤车辆,因而粉尘污染较大,加之路面受重车碾压经常破碎,给居民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而在2008年后,出于生态保护和安全生产的考虑,镇区内所有煤矿已经全部停产,镇区干净便捷的道路和景观绿化获得了居民的高度认同。据F1说:

以前这里相当灰,路全部是泥巴路,只要一下雨,满地都是稀泥巴,只能穿雨鞋出门,现在好太多了,每天有专门打扫卫生的人在扫地,路也变成石板路或者是柏油路,就没得以前脏了。

震前白鹿镇的公共区域几乎都是荒地,居民缺少聚会、娱乐的场所。震后新建的玫瑰广场、银杏广场等公共空间,不仅为居民提供了闲暇时间的游憩场所,也成为镇区的重要景观,吸引了外来游客的注意。每逢节假日,居民和游客都会聚在广场上,共同欣赏着各类演出。据F2说:

原来教堂很挤，而且没有现在那么漂亮，就是比较简陋。以前我们去找朋友玩就是直接去他家里面，现在……我们都可以去广场上聊天、跳广场舞，男的一般就去广场边上那个茶室里面打麻将。还有，原来外面没绿化，都是菜地或者荒地，现在都由政府统一做绿化，好看多了。

2.住房感知

震前，大多数居民的房屋都是砖房，经济条件差的居民房屋则是土坯房；灾后重建过程中，居民房屋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白鹿镇住房灾后重建分为统规统建、统规自建、原址重建、维修加固、异地安置五种方式。白鹿场社区作为白鹿镇的旅游接待中心区域被要求统一风貌，因而居民住房和商铺也按照不同区段分为明清川西建筑和法式建筑两种。该村社几乎都为统规自建房或原址重建房，其他村社多为统规统建房或维修加固房。重建后，整个白鹿镇的基础设施、房屋风貌等条件已达到了旅游城镇所应有的水平。

从五种类型居住方式来看，居民们对住房保持着较高的认同度。居民对“灾后重建让我的房子变得更好了”这一测量语句的感知均值达到了 4.09，表示其比较满意其住房现状。其中，统规统建类型的住户感知均值高达 4.19，维修加补助户的均值和原址重建的感知均值较低，分别为 3.85 和 3.88。在访谈对象对住房满意度的具体陈述中，“稳固”、“漂亮”、“方便”等词汇频频出现。由此可以判断，居民对新房的感知是建立在其使用功能性完善基础之上的。据 M1、M2 说：

（现在的房子）结构好，现在全部是钢筋，下面有地基，比较稳。原来的没有地基，就是用点鹅卵石把下面垫起，再抹点水泥，就用山上的那种石灰建的，稳固性没有现在好。

我们原来的房子是楼房，两层，一楼一底，有 140 多个平方。就是一个四合院，中间有天井。现在不同了嘛，因为要统一风貌，不可以建四合院了，每家都是这样一排排的楼房。但是现在的房子牢靠，也没有原来老屋那么潮。

在 17 位被访者回答“您会怀念以前的房子吗”这一问题时，有 12 人表达了对旧居的怀念。这种怀念表现的是居民对住宅情感上的依恋，也即地方感。住宅在此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物质空间，而是一个寄托了人的社会活动和情感意义的空间。居民住居时间越长，也会与房屋产生更紧密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多位被访者一再强调，尽管他们怀念老宅，但并不想回到原有的住房中去。这也是白鹿居民在功能性需要与情感性需要之间的一种必然抉择。据 F3、M3 说：

原来那个（房子）还是更安逸（好）些。我自己起（盖）的，觉得很满意。你想嘛，地震都没震垮，一丁丁点点都没得裂。拆（房）的时候好心痛哦，那挖掘机插那个房子，就像插在我的心头上，一点都不舒服。

（现在的房子与过去相比，）各有各的好处吧，我不能说哪个比较好，我觉得都不错。非要我选的话，我还是选择以前的房子。以前的房子有感觉一点，感觉我比较喜欢中国那种风格，我喜欢四合院的风格。……（我喜欢的）还有就是庭院吧，庭院里的秋千是以前我爸爸用轮胎做的，还有很大的桑树。

（二）居民对人口城镇化的感知

旅游业引发的人口城镇化，既包括外来从业人员的进入，也包括转化为服务业人口的当地原有农业人口[1]。随着白鹿镇的旅游城镇化进程的发展，白鹿镇能够提供的工作岗位也不断增多，这也吸引着附近乡镇居民乃至彭州和成都城区居民入驻。但由于白鹿镇旅游季节性强，且处于发展初期，劳动力需求量并不是很大。总体上，白鹿镇的人口城镇化呈现出一种“外来人口流入，本地人口流出”的特征。

震后，原有以黄连为主的中药材种植因水土变化而消退，煤矿也被关停，导致了白鹿镇剩余劳动力增多。一部分当地居民借助旅游业的发展，已转向和旅游相关的服务性行业。特别是邻近白鹿场中心区段的住户，大多利用自家房屋经营客栈、饭馆或是零售商铺。但从抽样调查的结果来看，居民直接从事旅游经营的比重仅为 39.8%（见表 4）。居民对“重建后的旅游发展让我的经济收入增多”语句选项的感知均值仅为 3.59，也反映出旅游发展对当地居民收入的提升作用较为有限。

表 4.白鹿镇居民就业情况抽样

职业	客栈	餐饮	零售	务农	其他
人数	34	18	30	64	60
占总人数比例	16.50%	8.74%	14.56%	31.07%	29.13%

相反，在比较收益的诱导下，本镇的年轻人更愿意选择到大城市里去寻找更具挑战性、收入更高的

工作机会或更优质的受教育机会。每到节假日,会有大量的年轻人回到家中,帮助在本地经营客栈、餐馆或商铺的中老年家人。这也造成了白鹿镇人口结构呈现出“候鸟型”和“空巢型”的特点。问卷调查显示,居民对“重建后的白鹿让我更离不开这里”这一语句项的感知均值仅达到3.84,说明居民们留守家乡的意愿并不十分强烈。据M4说:

以前我们在山里种黄连,黄连的价钱还很高。现在价钱低了,黄连也种不起了,(我们)就必须出去打工了。

旅游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本镇劳动力外流的缺口迅速由周边乡镇填补。这些外来人口大多数为中老年,主要从事工作清洁、安保、停车场管理等工作,也有部分中青年在旅游开发公司工作或从事个体经营。其中,清洁工、安保人员和停车场管理人员属于白鹿镇管辖,每月由各社区发放工资,但收入较低,一般每人每月2000元以下。2013年进驻白鹿镇从事旅游开发的四川宾吾谷集团,旗下经营实体包括了宾馆、婚庆中心、影楼、酒吧等。该公司从成都带来的经营团队,是白鹿镇最大规模的集体外来人口。受到旅游消费的刺激,当地服务业发展较快。客栈、餐馆、酒吧、购物店等商业场所集中分布在白鹿场社区。这些商铺多为个体租赁经营,经营者主要是来自周边城市或乡镇的外来人口。据F4说:

我是带小孩来这边上学,靠卖衣服赚点钱。在这里做生意还不错,每个周末和节假日客人要多些,平时就清闲些,但总体看还是要比工资挣得多些。

(三)居民对地域城镇化的感知

地域城镇化是指旅游业发展推动城镇在地域上扩张的现象。该现象在以旅游业为主要产业、旅游开发较早及旅游业发展时间较长的城镇较为显著[1]。虽然白鹿镇尚处于旅游发展初期,但其地域城镇化的特征已经较为显著。灾后重建过程中,出于统一安置灾民以及旅游发展的需求,白鹿镇将部分原有荒地、山地改造为统一安置小区、村民自建房或旅游接待设施,部分实现了白鹿镇的城镇功能更新。更为重要的是,震前白鹿镇不同社区、村庄之间相对独立、交通联系极为不便的情况,在震后得到了极大改变,震后新修的公路将各村社紧密联系在一起,促进了社区间合作。如上书院所在的回水村,虽距离白鹿场中心很近,但在震前公路绕行路程较长,然而在震后公路路况有了很大改观,且未来旅游规划还将修建一条由镇区通往上书院的游览步道。不同社区间联系的加强,使得旅游城镇的一体化成为可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接近五成的当地居民已经认同了白鹿镇的城镇化(见表5)。据M5说:

原来我们这里都是乡里,买个东西都要走几里路到场镇上去。现在方便得多,走几步路就有小卖部,到场镇骑个车去也就是十分钟。你问我这里是乡里还是城镇啊?你看这么多楼房,这么好的道路,我觉得就是城镇么。我们和场镇上的生活哪里有什么区别嘛。

表5.白鹿镇居民对该镇属性的感知

	城市	城镇	乡村	不确定
选择人数	6	92	100	8
占总人数比例	2.91%	44.66%	48.54%	3.89%

但是,生活在白鹿镇不同区域的居民对地域城镇化认知有所不同。在对各部分感知语句测量项的数据分析中发现,水观村居民的均值介于3.72—4.38之间,感知很好;白鹿社区居民的均值介于3.85—4.06之间,感知较好;回水村居民的均值介于3.14—3.99之间,感知一般。在对旅游城镇化的环境、基础设施和生活便利三个方面的形态感知中,也同样呈现出这一特征(见表3)。白鹿镇各类旅游项目和设施几乎都投入到白鹿场和水观村两个社区,回水村虽拥有上书院遗址,但因无配套旅游设施,游客逗留时间短。问卷分析显示,白鹿场和水观村居民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者占比分别达到了14%和15.1%,而回水村则只有3.4%。显然,回水村属于旅游发展的边缘社区,因而居民对地域城镇化的感知度较另两个社区更低。

(四)居民对社会观念和生活方式城镇化的感知

旅游城镇化不仅促进城镇规模的扩大,同时还会促进农村社会观念、思想意识、生活方式的城镇化转变[1]。这种“质”的转变,一方面是伴随着城镇的扩张逐步进行的,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旅游者的“示范效应”带动的。在这种剧烈变化中,当地居民的社会适应能力经受着考验。对于统规自建和原址重建住房的居民而言,由于原有的社会空间并未被分割,因而邻里社会交往不但未受到影响,反而因集中居住而增加了交往的频率。据M6说:

我们有什么红白事不用开腔,邻居都会自己来,

对我们很好。我们现在吃了饭，就会一起去哪家聊天。你今天在哪打工什么的，就是这些龙门阵。现在搬到一起更紧密，要更好些。

尽管灾后重建变原有的散居模式为聚居模式，增加了相互间交流的可能性，但交流的机会仍然受到闲暇时间、交流地点和交流方式的限制。在统规统建住房中，这一特征尤为明显。城镇化的小区式住房不仅改变了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同时也改变着居民之间固有的人际关系。据 F5、F6 说：

搬来这边的人还是原来周围的那些人。总觉得邻居关系不像原来那样了，不能到处串门了。但现在只要喊走啦，吃饭了，开会了，大家都会下楼来耍。还是更喜欢原来那样。

到现在我还是会经常想起原来的家来。我从嫁过来这一直住了 20 多年了，总觉得好舍不得啊。原来抬着饭就可以往别人家里跑，现在大家回家就把门关了。我都不好意思去人家里。现在我们都去坝子里耍，在屋子里不舒服嘛。

四　居民对旅游城镇化感知差异的影响因素

居民旅游感知差异的影响因素一般认为主要包括居民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居住年限等人口统计学事项，以及居民是否参与旅游开发、对社区文化和经济的依赖度等。也有学者将影响因素归为旅游地类型、旅游地发展程度等外生变量和居民的人口学特征、出生－居住地、居民感知距离等内生变量[30]。本研究中，居民感知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旅游城镇化的不同层面上，其影响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1.旅游地生命周期阶段

以旅游地生命周期而论，白鹿镇处于旅游发展阶段，加之受到灾后重建的影响，当地进行了大量基础设施和景观建设，物质环境相较过去有较大改善，因而容易获得本地居民的一致良好认同。

2.居民与外来人口比例

以游客活动较多的白鹿场和水观村来看，两个社区常住人口总计 2677 人，2014 年日均游客量约为 2740 人，日均旅游者/常住居民为 1.02，但若考虑到该地外出务工居民较多，而外来打工和经营人口较多，则这一比例还应大大增加。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一方面，给本地居民造成了一定的生活不便。每逢节假日，白鹿镇旅游核心区不到两平方公里区域内瞬时客流常常超出环境容量。如 2014 年春节期间，白鹿镇游客量高达 16 万人次，由此造成居民出行困难、当地物价水平升高等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外来务工人员和经营者挤占了一定就业机会，也引发了当地居民的一些不满。因而，白鹿居民对人口城镇化的良性感知度较低。

3.居民住所与旅游核心区的距离

一些研究者发现，城市型旅游地居民的旅游感知差异较少受到居民感知距离的影响，而资源型旅游地居民对旅游的支持态度则呈现出距离衰减的特性[30]。白鹿镇旅游区划较为明显，作为旅游重点规划区，白鹿场和水观村拥有优先发展权，也是客流最为集中的区域。因此，两个社区居民直接参与旅游的机会要远大于回水村居民，他们对旅游地域城镇化的正面评价也较高。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白鹿场居民对旅游经济的依赖性要大于水观村，但由于旅游发展前白鹿场一直是镇区所在地，而水观村属于农业人口占主体的传统乡村，在当地政府将水观村纳入旅游城镇化优先发展范围后，水观村居民对由此引发的物质环境改善和经济转型的良性感知度显然要高。距离对居民感知差异的显著影响，也表明了白鹿镇旅游城镇化建设尚不完善。

4.灾后重建住房类型

白鹿镇居民的住房类型中，以统规自建、原址重建、维修加固和统规统建等类型较为多见。住房类型对居民生活方式的影响较大，统规自建、原址重建和维修加固住房基本沿袭了居民原有的生活方式，而统规统建住房则对居民既有生活方式的改变较大。因而，在对生活适宜性的评价中，前三类住房中的居民感知度要大于最后一类。

五　对白鹿镇旅游城镇化建设的反思

费孝通先生曾指出，小城镇具有拦阻和蓄积人口流动的作用，是防止人口向大城市过度集中的“蓄水池”[31]。乡村(镇)旅游则通过“离土不离乡”的方式，有利于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以实现农民充分在地就业[32]。尽管受到旅游发展的带动作用的影响，白鹿镇在基础设施和住房重建方面取得了居民的高度认同，但旅游业在吸引当地居民在地就业、减缓人口外流方面的作用并不显著。同时，白鹿镇在地域城镇化及社会观念和生活方式城镇化上所呈现的居民感知差异，亦表明居所区位和重建政策可能引致地方资源的分配不均，进而影响到居民的受益度和认同度不一。因而，有必要基于居民地方感

的视角对白鹿镇旅游城镇化建设进行反思。

(一)旅游城镇化外部导向性特征明显

白鹿镇旅游城镇化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部力量。灾后重建过程中,福建厦门援建方提供的规划方案和建设资金是其产业迅速转型的关键因素。在旅游发展进程中,外来游客和经营者又为白鹿镇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经营理念以及社会观念。因而,白鹿镇旅游城镇化水平的提升明显具有外部导向性特征。旅游业受市场影响较大,属于高度敏感性行业。从目前白鹿镇旅游客源市场构成来看,主要集中在以成都为中心的短途游客。一般为一日/两日游游客和避暑型常住度假游客。每逢节假日以及夏季,白鹿镇游客数量急剧增加,而在工作日和旅游淡季,白鹿镇的旅游经济呈现出低迷的态势。

徐红罡认为,旅游基础设施和接待设施的建设超前于游客需求,会导致"过度城市化",从而诱发负反馈机制,制约城镇的发展[33]。白鹿镇灾后重建中所采用的外部导向型的旅游城镇化发展模式,尽管消除了前期基础设施资金投入巨大之虞,但其发展进程仍为振幅较大的波动式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白鹿旅游业的发展并未造成大批本地外出务工者返乡从业,当地居民的地方认同也并未有明显提高。显然,这些将严重影响白鹿镇旅游城镇化的持续稳定发展。因此,白鹿镇的旅游城镇化建设必须以本地居民的安居为目标,营造一个居者有其家、望得见乡愁的新型旅游城镇。

(二)旅游城镇化区域发展不平衡

国外学者运用核心—边缘理论对旅游区进行了空间演化研究。Weaver 发现,旅游业会加剧区域之间已有的不平衡发展[34];Walpole 与 Goodwin 认为,旅游核心区与边缘区在就业和收益上存在分配不平等现象,旅游发展更有利于旅游目的地城市居民和外来经营者而不是乡村居民[35]。尽管中国区域旅游的非均衡发展现象较为突出,但也有学者认为,区域旅游空间格局会以离散形、聚集形、扩散形、均衡形四种空间结构形态不断演化,从而实现由中心向边缘分级扩散、中心—边缘动态均衡的旅游全面发展[36]。

在白鹿镇旅游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地域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目前在重点推进的白鹿场、水观村和回水村三个旅游片区中,主要游客都集中在白鹿场的中法风情街和明清老街消费,这为白鹿场居民参与旅游经营带来了便利,出租铺面房或直接经营旅游餐住收入构成了他们重要的经济来源;水观村有部分农户经营简餐或客栈,统规统建的高层住宅小区内则几乎无居民参与旅游,只有少量居民将自有住房出租给来此短住的避暑游客;回水村则只有几户居民在上书院附近售卖土特产。由此,居民对旅游的经济依赖性在白鹿场、水观村、回水村三个区域呈现依次递减的状况与格局。这种旅游不平衡发展的空间格局会形成物流和人流在中心区的极化效应,从而导致外围区域被边缘化。2015 年以来,白鹿镇陆续引入的白鹿河漂流项目、恐龙园项目等,都选址于位于旅游核心区的水观村,加剧了当地旅游发展的不平衡,体现了资本对资源和土地利用的垄断性特征。然而,旅游城镇化的目标在于通过旅游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因而鼓励和推动外来旅游资本向周边区域扩散,提升边缘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的机会,有助于实现白鹿镇全域旅游的发展。

(三)"自上而下"的旅游城镇化

一般来说,一个地方要进行旅游城镇化,必须走过旅游发展的探查、参与、发展、巩固、停滞和衰落或复苏等旅游生命周期阶段。在旅游发展的起始阶段,多由当地自发性地开展小规模、低水平的旅游接待服务,此后随着游客量的上升,在政府的有效引导和规范下,旅游接待设施规模和质量才会得以逐步提升,最终实现旅游城镇化。前期建设资金短缺、发展起点低、发展速度慢是这种"自下而上"旅游城镇化发展模式的主要特点。

白鹿镇的旅游城镇化发展有其特殊的灾后重建背景。在产业重组和乡镇重建的双重紧迫需求下,由外省援助、政府牵头、公司经营、居民参与的旅游城镇化建设,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旅游城镇化的跨越式发展。这种"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有着建设资金充足、发展起点高、发展速度快的特点。尽管这一模式对旅游基础设施和专用服务设施的建设、对旅游目的地的推广营销都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但由于旅游经营管理和利益分配方式都由政府决定,居民缺少参与旅游决策的机会,从而容易引发居民对旅游发展公平性的不同看法,最终可能导致社会冲突。有鉴于此,在当前白鹿镇旅游已经积累了一定经验的基础上,适当地吸收一些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决策和地方规划建设事务,乃至合股集资成立旅游合作社,都是值得尝试的做法。

六　结论

旅游城镇化对白鹿镇经济发展、居民生活条件改善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旅游业是灾后白鹿镇地方更新和社会重构的发动机。郑诗琳等也在研究中发现，白鹿镇的旅游城镇化促进了当地物质环境的改善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并使得居民对地方的认同感增强[37]。但这一结论是基于居民整体感知而得出的。而本文的研究恰恰说明，当地居民对旅游城镇化的各个层面感知并未保持着高度一致的认同。总体来看，居民对白鹿镇景观城镇化情况感知良好，对人口城镇化感知较差，对地域城镇化及社会观念和生活方式城镇化的感知则在不同居住区域和住居模式的居民间出现了差异。研究发现，白鹿镇所处的旅游地生命周期阶段、居民与外来人口比例、居民住所与旅游核心区的距离、居民灾后重建住房类型等因素是居民感知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

5.12 地震之后，四川省多个重灾区试图将旅游业作为城镇化建设的主导产业。在灾后重建初期，“三高一统”④的汶川模式[38]在汶川水磨镇、北川县城等地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在经历了短暂的喧嚣后，不少重建的旅游地出现了市场衰退的趋势，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反思。旅游城镇化的外部导向性、城镇化区域发展不均衡、单一的“自上而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可能正是这些旅游城镇成为“空中花园”的主要原因。有鉴于此，地方在旅游城镇化建设之初，应当立足于当地居民的发展意愿，从保障政策的公平性、居民生计持续性和社会网络延续性的角度来进行思考。只有在当地居民拥有较多正向地方感的前提下，旅游城镇化才可谓是获得了真正的成功。

综观国内基于居民地方感展开的旅游实证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多采用量表分析，研究内容偏重于解释旅游影响和居民对于旅游发展的态度，尽管案例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仍然有待进一步完善。事实上，本文在上述几个层面上均有所突破。第一，在对旅游城镇化的居民感知研究中，以往研究多注重居民旅游感知的整体性认知，本文则着重对居民不同层面的感知差异及其原因进行分析，拓展了地方感理论的应用；第二，本文采用量表统计与结构式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避免了单一定量研究的局限性；第三，本文从当地居民主位视角出发，来讨论灾后旅游重建政策的适宜性，对于地方的规划制定和政策安排提供了新的思路。当然，本文在地方感测度指标的选取、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的综合等方面还有较大的探索空间，期待后续研究的完善。

注释：

①农家乐日租价格包含一日三餐及床位一张。

②数据来源于成都市基层公开综合服务监管平台－白鹿镇水观村，http://jcpt.chengdu.gov.cn/pengzhoushi/shuiguancun/300101/cunqgk.html。

③被访者以 F 表示女性，M 表示男性。

④“三高一统”是指高目标引导，高起点规划，高质量建设，统筹整体推进。

参考文献：

[1]王红，宋颖聪.旅游城镇化的分析[J].经济问题，2009，(10)：126-129.

[2]李强，陈宇琳，刘精明.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12，(7)：82-100.

[3]吴丽敏，黄震方，曹芳东，等.旅游城镇化背景下古镇用地格局演变及其驱动机制——以周庄为例[J].地理研究，2015，(3)：587-598.

[4]杨俊，席建超，解鹏，等.基于 CA 模型的旅游小镇增长的时空模拟与应用——以河北三坡镇为例[J].地理研究，2013，(5)：915-923.

[5]李欣华，吴建国.旅游城镇化背景下的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传承——贵州郎德模式的成功实践[J].广西民族研究，2010，(4)：193-199.

[6]刘雪春，刘又堂，李诗颖.桂西资源富集区旅游城镇化与环境保护耦合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4，(9)：34-37.

[7]赖晓华，聂华，滕汉书.西部民族农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模式探讨[J].贵州民族研究，2014，(7)：134-137.

[8]张新生.旅游推动城镇化建设的典型模式与问题研究[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72-80.
[9]朱迪.城镇化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4.
[10]辜胜阻,刘江日.城镇化要从"要素驱动"走向"创新驱动"[J].人口研究,2012,(6):3-12.
[11]王格芳.科学发展对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J].理论学刊,2013,(10):68-72.
[12]CRESSWELL T.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M].徐苔玲,王志弘,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
[13]朱竑,刘博.地方感、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等概念的辨析及研究启示[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1):1-8.
[14]MASSEY D. A global sense of place[J]. *Marxism Today*, 1991,(June):24-29.
[15]唐文跃,张捷,罗浩,等.古村落居民地方依恋与资源保护态度的关系——以西递、宏村、南屏为例[J].旅游学刊,2008,(10):87-92.
[16]唐文跃.旅游开发背景下古村落居民地方依恋对其迁居意愿的影响——以婺源古村落为例[J].经济管理,2014,(5):124-132.
[17]范莉娜,李秋成.社会资本、地方感对民族村寨旅游中居民支持态度的影响[J].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2016,(3):337-344.
[18]汪德根,王金莲,陈田,等.乡村居民旅游支持度影响模型及机理——基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苏州乡村旅游地比较[J].地理学报,2011,(10):1413-1426.
[19]尹立杰,张捷,韩国圣,等.基于地方感视角的乡村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研究——以安徽省天堂寨为例[J].地理研究,2012,(10):1916-1926.
[20]张朝枝,曾莉萍,林红霞.社区居民对景区开发企业社会责任的感知——基于地方依恋的视角[J].人文地理,2015,(4):136-142.
[21]孙九霞,周一.遗产旅游地居民的地方认同——"碉乡"符号、记忆与空间[J].地理研究,2015,(12):2381-2394.
[22]郑群明,夏赞才,罗文斌,等.世界遗产申报对居民地方感的影响——以湖南崀山为例[J].旅游科学,2014,(1):54-64.
[23]保继刚,杨昀.旅游商业化背景下本地居民地方依恋的变迁研究——基于阳朔西街的案例分析[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49-54.
[24]陈亚颦,徐丽娇.西双版纳傣族社区居民地方感变化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40-48.
[25]高艳,赵振斌.宗教旅游地多群体感知空间结构——基于地方理论的解析[J].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2016,(2):211-219.
[26]邱慧,周强,赵宁曦,程萌.旅游者与当地居民的地方感差异分析——以黄山屯溪老街为例[J].人文地理,2012,(6):151-157.
[27]卢松,张捷,李东和,等.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比较——以西递景区与九寨沟景区为例[J].地理学报,2008,(6):646-656.
[28]周智,黄英,黄娟.基于居民感知的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研究——以云南大理古城周边地区为例[J].现代城市研究,2015,(5):112-118.
[29]焦华富,丁娟,李俊峰.旅游城镇化的居民感知研究——以九华山为例[J].地理科学,2006,(5):5635-5640.
[30]杨兴柱,陆林.城市旅游地居民感知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系统分析[J].城市问题,2005,(2):44-50.
[31]费孝通.小城镇,大问题[J].江海学刊,1984,(1):6-26.
[32]郭凌,王志章.乡村旅游:实现农村包容性增长的路径选择[J].学术交流,2012,(8):102-105.
[33]徐红罡.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动态模式探讨[J].人文地理,2005,(1):6-9.
[34]WESVER D. Peripheries of the Periphery: Tourism in Tobago and Barbuda[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8,(2):292-313.
[35]WALPOLE M J, Goodwin H J. Local Economic Impacts of Tourism in Indonesia[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0,(3):559-576.
[36]史春云,张捷,尤海梅,等.四川省旅游区域核心——边缘空间格局演变[J].地理学报,2007,(6):631-639.
[37]郑诗琳,薛熙明,朱竑.新生的旅游地:灾后重建背景下的地方重构[J].旅游学刊,2017,(5):59-70.
[38]郑柳青,邱云志.基于灾后旅游重建的"汶川模式"研究[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107-112.

[责任编辑:钟秋波]